

内蒙古走出能耗困境需加快转型步伐

刘秀凤



业结构中,煤电、煤化工等都是煤炭消耗大户。

高耗能产业比例过大,是内蒙古节能工作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2018年,内蒙古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18727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3.0%。其中,包括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在内的七大高耗能产业占全区综合能源消费量的95.5%。分地区来看,位居前两位的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的能源消费量共占全区总消费量的74.5%,其能源消费量分别为5394万吨标准煤和3196万吨标准煤。煤化工、钢铁、稀土、煤电等高耗能产业在这两个城市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产煤地区,煤炭消耗量同样惊人,煤炭在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为385723万吨标准煤,而同年内蒙古全区的煤炭消费量达到38595万吨标准煤,约占全国的1/10。在内蒙古的产

煤。但实际上,在“十三五”前4年,能耗强度累计上升9.5%,2019年能源消费总量较2015年增长6562万吨标准煤,已达到“十三五”增量目标的184%。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和多数地区能耗强度下降的情况下,内蒙古能源消费同比增长6.3%,能耗强度同比上升10.56%,要想实现“十三五”能耗双控目标形势十分严峻。

虽然非煤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传统产业仍是当前内蒙古工业发展的主导,产业链短、主要产品附加值低、一煤独大的局面仍未改变,工业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内蒙古的问题,在不少资源依赖型地区同样存在。

直面问题、高度警醒、深刻反思、有所作为,此次约谈对内蒙古节能主管部门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走出能源消费困境,内蒙古必须调整和改进区域产业发展的思路和重点,减轻对能源

的依赖,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方面,下决心压缩传统重化工业等高耗能产业,淘汰落后、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壮大以装备制造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和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增长新引擎。转变产业发展重点,需要相应转变金融、投资、财政、土地等政策的扶持方向和重点,使其切实向非资源型产业转移。地域辽阔、能源丰富是内蒙古的优势,但不能因此忽视对能耗问题的管控,更不能为了招商引资而降低标准。

控制增量、减少存量,不仅要借助科技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经济政策的引导作用。去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新建高耗能项目能耗等量或减量置换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对高耗能行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及以上标准煤的新建及改扩建项目实施用能指

标管理,项目办理节能审查时,须通过能耗等量或减量置换获取项目用能指标。这一文件的发布有助于借助市场化手段,调动企业节能积极性,抑制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

其实,除了煤炭,内蒙古的风能、光能资源同样丰富,但因为外送通道、储能、电力调峰等问题,前几年弃风、弃光问题严重。如何将清洁能源切实利用起来,增加就地利用比例,提高能源结构中的非化石能源比重,也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能耗问题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将工作做在平时、抓细抓实。“十三五”即将收官,内蒙古完成能耗双控目标任务需要科学谋划、对症下药,而不能病急乱投医,甚至粗暴地搞“一刀切”。尤其随着天气转凉,北方供暖季即将来临,保障居民供暖需求是硬杠杠,决不能为了“数据达标”而损害群众利益。

因为节能工作存在严重问题,内蒙古自治区节能主管部门日前被国家发展改革委约谈。内蒙古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1.7%,但消耗了全国5.2%的能源。能源消费总量大幅增长,能源结构调整缓慢,能源资源丰富的内蒙古,正在为“能”所困。

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产煤地区,煤炭消耗量同样惊人,煤炭在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为385723万吨标准煤,而同年内蒙古全区的煤炭消费量达到38595万吨标准煤,约占全国的1/10。在内蒙古的产

为城市留下一片原野

姚华松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白天教学科研工作繁忙,下班后还要接送、陪伴孩子,一周下来经常身心俱疲。我的解压方式是在周末约上一帮朋友爬山徒步,目的地是城市郊区的一些荒山原野。这些地带尚未开发,没有硬化道路。在这里邂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溪水潺潺、虫鸣鸟叫,和朋友聊聊天、开心的事,逃离手机干扰,畅快淋漓地汗流浹背一整天,能让人迅速卸掉平日的浮躁与无可奈何,顿感心旷神怡。

不少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会有同样的感受,快速、程式化的都市生活让人备感压力,逃离喧嚣,亲近自然成为切实需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都市人的健康意识更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爬山、徒步等方式增强体质、疏解压力。

然而,去年底至今,我常去的部分山地被围挡起来,欲进入城市公园、山顶公园建造等开发活动。正在挖坑和整理树枝的工人们说将要修建盘山公路,道路两边将种植景观树。可以预见,一段时间之后,这里会是另一番车水马龙的景象,可能带来纯天然的生态空间被高度人工化,动植物的原生栖息地被迫迁出,城市的建成区面积越来越大。

从前,我很庆幸城市近郊有一些保育完好的自然山体 and 原野,现如今,它们却难逃被开发的命运。在不少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在土地和空间成为重要城市资本的形势下,原野、原生态地块越来越稀少。然而,放眼国际,提高城市范围内原生生态自然环境的比例,正在成为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共识,不少欧美国家先后提出“荒野保护”“重新自然化”“景观生态学”“再野化”“生态修复”等理念,持续推进城市的再野化及生态修复工程。而荒山野岭的消失正与此背道而驰。

良好的生态环境、较高的原野覆盖率,不仅可以传承和丰富城市的生物多样性,还能消解现代都市人的焦虑情绪。在推进城市发展建设的时候,不能一味压缩绿地面积、将自然空间改造为人工空间。在建设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的过程中,市区的公园和郊区的原野应该和谐共存。在加大公共服务设施资金投入,持续推进城市各级公园、绿道、栈道等建设的同时,对于都市郊区的荒山、荒野等自然生态基底较好的区域,更宜“无为而治”,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视情况留出一定的“禁建区”,即除了满足少数人徒步、标本采集和地理数据收集等需求外,禁止开发行为,尽可能保持初始的原野状态,尊重原生动植物栖息和发展的权益。

为城市留下一片原野,保持城市环境人地关系的和谐共生,未来城市发展才更有竞争力。

◆时应征

为适应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很多企业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及时调整了产品生产计划。此时,承担“守门员”任务的项目环评审批工作也面临新情况。

一方面,环评审批是开工建设的必要条件,关系到企业的复产、转产效率。另一方面,环评审批业务工作量巨大,各地施行机制各不相同,有的在生态环境局,有的在审批局,有的在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后台转到生态环境局。

如何进一步做好环评审批服务工作,确保市场主体稳定运行?结合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相关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五个转变入手,提升环评审批服务能力。

从报批制向告知承诺制转变。相对传统的报批制,告知承诺制可以最大化缩短环评审批时间,提升审批效率,帮助企业尽快实现复产、转产。各地的审批改革可以从生产工艺简单、污染物排放稳定、拟采取的治理措施成熟、总体环境影响较小的行业开始,确保风险可控。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缩短了时间,也不得人为降低环评要求,应严格按照告知承诺制的适用条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行,加强事后监管,定期督促企业履行承诺的情况,及时纠正偏差,并综合运用信用

五个转变提升环评审批服务能力

手段,加强对企业的失信惩戒。

从见面审批向不见面审批转变。疫情期间,借助“互联网+”技术,不见面审批成为许多地方推进政务服务优先事项的,一些地方已经整合资源,实现了一网通办、异地办理,既提升了企业办理业务的便利性,也减少了环评审批人员的工作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环评审批要对审批内容开展技术审查,即使不见面,与环评单位或建设单位的沟通交流也不可避免。因此,在采取不见面审批时要重点提升沟通效率,注重宣传引导、信息公开、优化流程等。

从项目环评向区域环评转变。产业园区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工作场、科技园正成为很多地方重要的经济载体。对于一些规模不大、产品更新迭代快的园区,尤其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污染物排放很少、环境影响较小的科技园,可以在开展区域环评的基础上,简化具体的项目环评。

苏州工业园区的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大都集中在生物医药产业园中,苏州工业园区以此

为试点,围绕试点中项目的引进规划、污染物排放总量、环境保护设施、环境管理制度等开展综合环境影响评价,通过综合环评审批后,入驻这一试点、符合环评要求的研发项目,可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和要求。从数据孤岛向数据共享转变。在环评文件中,除了建设项目信息外,往往还需要引用环境现状监测数据、地理信息数据、国土空间测绘信息、气象信息等,必要时还要开展监测、调查。这些信息一般时效性相对较弱、信息覆盖范围较大、通用性较强,但生成信息的数据调查所需时间较长,投入成本较高。

建议相关部门积极在环评单位或建设单位推进数据共享,既能减少重复性的监测调查工作,提升环评编制效率,也能为企业减轻经济负担。

苏州工业园区结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需求,主动发布、提供区域空气、地表水、土壤、噪声等环境质量信息和监测数据,建设单位编制环评文件时可直接引用。同时,要求环评机构不得另行就引用

的数据向建设单位收取费用,这些做法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从被动咨询向主动公开转变。为推进“放管服”改革,国家对环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进行了许多优化调整,各级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改革举措,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部门需要及时将新政策、新要求传达给企业。此外,环评编制单位的能力水平参差不齐,给企业选择环评单位带来了一定困难。面对被动接受咨询,生态环境部门应主动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服务。

苏州工业园区规范涉及环评工作的政府信息公开、发布、维护、更新等环节,完善办事指南,通过微信、网站等及时发布环境质量、环评政策等信息,增加环评技术单位查询等功能。组织开展环评技术单位考核评价,及时公开考核结果供建设单位参考,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技术单位实施失信惩戒。通过一系列举措,环评业务问题咨询量有所减少,提升了环评编制和审批的效率。

◆罗锦程

天鹅之殇还会重现吗?

◆王争亚

今年5月,在郑州市北龙湖和贾鲁河生活的两对疣鼻天鹅分别成功自然孵化13只天鹅蛋,给市民和众多摄影爱好者带来了满满的欢愉。

但令人痛心的是,在贾鲁河栖息的“天鹅妈妈”于9月15日不幸去世,参与救助的野生动物专家对天鹅尸体进行解剖时发现,其肝脏明显病变且肠道出血。专家称,天鹅真正的死因还要进一步化验检测后才能得知。

在有关方面对天鹅死因得出权威结论之前,不少人对于贾鲁河的水质提出了质疑,更有网友在微信上晒出了贾鲁河水域某点位有污水排放、部分河段被污染、天鹅被暗黑色污水包围的视频和图片。

天鹅已死不能复生,大家最大的心愿就是天鹅之殇不再重现。然而,就在天鹅妈妈死后第3天,贾鲁河又有1只小天鹅吞食了钓鱼线并被鱼钩挂伤腿部,被送往动物救助点抢救,万幸的是小天鹅没有生命危险。其实早在上半年,在北龙湖生活的成年母天鹅就曾被飘落的网绳挂住,数日后才被湖区工作人员成功解救。

半年之内连续发生多起疣鼻天鹅死亡或受伤事件,使当地群众对保护疣鼻天鹅的关注度骤然上升。不少群众纷纷通过市长

热线等途径向当地政府反映情况,希望有关职能部门能够施以援手,保护好其余的天鹅。

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疣鼻天鹅未能得到良好的保护,其多舛的命运令人忧心。相关部门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应做得更好一些。目前,仍有污染源向河道尤其是有天鹅栖息地的河道排放污水;天鹅栖息地水域岸边均有不少“禁止钓鱼”“禁止游泳”宣传标牌,但现场垂钓和游泳的人仍随处可见;随着候鸟迁徙季节的到来,天鹅须补充食物和能量,相关管理部门却无人定点定时为天鹅提供充足的食物,而围观的群众随意投喂各种各样、甚至是不洁的食品等。诸如此类已经或者可能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现象时有发生,是时候该管管了。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有更加积极的作为,进一步加强合作,各司其职,切实从宣传、监管、执法等方面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两起天鹅伤害事件发生后,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已于近日在天鹅栖息地召开了由各方向人士参与的现场会,具体研究下一步将采取的保护措施。愿这些措施能够落地见效,切实保障美丽的天鹅创造宁静、舒适、安全的栖息环境,避免天鹅之殇重现。

以色列电子废物管理有哪些经验?

任延伸制度,承担电子废物的回收处理责任。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电子废物或与有电子废物处理资质的企业合作处理,最终实现对电子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以色列环境保护部作为以色列电子废物处理行业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国内废弃手机、电视机、冰箱等电子废物的拆解处理和后续回收利用。

《电子废物法》施行后,各相关方的责任进一步明确。电子产品制造商和进口商需建立电子产品销售台账,标明已销售电子产品的种类、重量以及数量,并将有关数据报送至拥有电子废物处理资质的企业供参考和汇总。电子产品制造商和进口商有义务回收其生产或进口的电子产品,年回收量不少于其年总销量的50%;电池制造商和进口商有义务回收其生产或进口的电池产品,年回收量需占其年总销量的25%-35%,所有的电池销售商必须在店内设置投放废弃电池的专用容器。实施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促进二手家电得到妥善回收与利用,减轻废弃电器无序流动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风险。各地方政府需建立电子废物循环利用中心,协助安排电子废物处理企业上门回收废弃电器,同时设

置电子废物专用回收箱,帮助居民实现电子废物的精准分类与投放。居民需按照当地政府规定,依法依规分类投放电子废物。

《电子废物法》还规定,以色列有关政府部门可对电子产品生产者和进口商征收一定数额的税款。在对电子产品正式征税前,以色列环境保护部部长需征得财政部部长同意,并与工贸和劳工部部长协商一致,最终还应获得以色列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的批准。政府专注于电子废物现代化管理的应用型人才,培育一批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电子废物处理龙头企业,不断创造回收电子废物衍生出的绿色就业岗位,服务国家“六稳”“六保”工作。

随着电子废物回收处理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电子废物处理能力的持续提升,以色列电子废物的回收利用率有望从2014年的15%提升至2021年的50%,由电子废物带来的环境污染压力将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此外,以色列境内铅蓄电池、镍镉电池与其他电池的回收率在2019年也分别达到30%、35%和25%,较2014年的20%、20%、12.5%均有了明显的提升。

我国作为全球电子废物的产生大国,在电子废物的精细化管理方面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仍存有一定差距,在电子废物的回收利用环节尚有许多障碍,亟待逐个突破。建议借鉴以色列国情,参考借鉴国际有益经验,遵循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原则,加强协同合作,进一步建立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健全电子废物处理经费保障体系。加大对电子废物黑色产业链的打击力度,培养专注于电子废物现代化管理的应用型人才,培育一批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电子废物处理龙头企业,不断创造回收电子废物衍生出的绿色就业岗位,服务国家“六稳”“六保”工作。

以“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为抓手,结合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做好针对电子废物管理的顶层设计,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型环境治理体系,同步推进电子废物处理行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开展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电子废物管理国际合作,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促进、相互赋能的新发展格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视域下,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绿色金融的三重效益

◆刘瀚斌

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第三次联席会议近日召开,总结讨论了绿色金融改革的进展。自201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全国首批8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出了许多操作路径。

总体上,各试验区绿色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不仅在产业引导、技术更新等方面起到支持作用,还逐渐延伸至社会治理领域,形成了“产业优化—资源增值—社会治理”的综合效益。绿色金融和自愿型、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有机结合,逐渐展现出复合性政策工具的特征,发挥着三重效益。

第一,绿色金融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升级。

绿色金融的核心是通过金融手段促进地方绿色发展和结构转型,使得金融资源配置、信贷投向、融资结构更加绿色化和实体化。在试验区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践中,如何进行绿色企业或项目的识别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探索建立绿色金融标准及评价体系,筛选确定绿色项目库,定期开展绿色企业、绿色项目的遴选、更新和发布,及时进行行政、银、企对接是有效手段。

绿色金融通过投融资工具引导资金流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行业。特别对于许多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较小但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小城市而言,绿色金融的引入无疑会对城市发展、产业升级起到更强的推动作用。

比如,在绿色金融的有力支撑下,浙江省湖州市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将“金融+”和“生态+”深度融合,推出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园区贷等多种绿色金融产品。湖州银行推出的园区贷产品,为吴兴区沙湾城园区建设和园企企业生产经营提供贷款,不仅帮助园区实现了统一供能和污染排放处理,也促进了传统小微企业入园集聚和转型发展。据测算,小微企业入园后每年可减少污水排放100万吨、节电1300万千瓦时、减少粉尘排放12.6万吨。湖州市还率先搭建绿贷通银企对接服务平台,创新信贷超市和银行抢单两种模式,建立绿色企业信息服务平台,为银行提供以“公共信用信息+绿色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绿色信息档案查询服务。2018年,绿贷通平台累计帮助5719家企业获得银行授信479.14亿元。

第二,绿色金融能够促进自然资源要素流动、合理配置和溢价增值。许多试验区将地区内生态资源确权,建立其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经营权、管理权等多种权益,探索建立水权、排污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打造生态文化产品,让环境治理、节能低碳的企业优先获得土地、人才等政策支持。比如,湖州市安吉县成立了两山生态资源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通过梳理筛选县域生态资源,按照区域、产业分类,邀请优秀策划团队,将生态资源整合为集中连片优质的项目包,再进行产权收储和资源再提升,最终推向市场进行价值评估、项目增信和市场交易。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策划团队、金融机构、高校研究机构等有序参与,对村镇的集体产权改革、自然资源整体保护等都进行了创新探索。

第三,绿色金融能够助力现代化社会治理。通过绿色项目、产品、企业等识别,可以逐步构建以“绿色”为标识的社会信用体系。比如,浙江省衢州市构建了全市统一的绿色金融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个人和企业的绿色信用程度、历史都在这一平台上显现,同时,衢州市金融管理部门创新平台建设,将“评价、监管、应用”三大体系有机结合,贯穿在融资、贷款、申请补贴、行政审批等若干环节,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丽水市则通过“两山贷”促进乡村治理。在丽水市云和县委管理评级为基础,对水源地保护、参加植树造林、正确垃圾分类等一系列生态环保行为进行正负面清单的评定,基于评分对生态信用好的农户给予一定额度的贷款,最高可以达到500万元授信额度。不仅解决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也对乡村发展绿色产业起到激励作用,激发了村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通过观察梳理试验区的各类创新实践发现,绿色金融既促进了资金流向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产品,也对自然资源自身的价值进行了金融量化,更将绿色信用、绿色意识融入了社会治理中。企业实现了生产服务绿色化,公众提升了环保素养,社会形成了环境守信氛围,熏染优良地区释放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城市治理逐步提高了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能力水平。